



저작자표시-비영리-변경금지 2.0 대한민국

이용자는 아래의 조건을 따르는 경우에 한하여 자유롭게

- 이 저작물을 복제, 배포, 전송, 전시, 공연 및 방송할 수 있습니다.

다음과 같은 조건을 따라야 합니다:



저작자표시. 귀하는 원저작자를 표시하여야 합니다.



비영리.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영리 목적으로 이용할 수 없습니다.



변경금지.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개작, 변형 또는 가공할 수 없습니다.

-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의 재이용이나 배포의 경우, 이 저작물에 적용된 이용허락조건을 명확하게 나타내어야 합니다.
- 저작권자로부터 별도의 허가를 받으면 이러한 조건들은 적용되지 않습니다.

저작권법에 따른 이용자의 권리는 위의 내용에 의하여 영향을 받지 않습니다.

이것은 [이용허락규약\(Legal Code\)](#)을 이해하기 쉽게 요약한 것입니다.

[Disclaimer](#)

碩士學位論文

韩国的身份认同

中國語翻譯論文



濟州大學校 通譯大學院

韓 中 科

崔 哲 雄

2007年 2月

韩国的身份认同

— 『 韩国的身份认同』 韓國語 翻譯 論文—

指導教授 金 中 燮

崔 哲 雄

이 論文을 通譯翻譯學 碩士學位 論文으로 提出함

2006 年 12 月

崔哲雄의 通譯翻譯學 碩士學位 論文을 認准함

審査委員長 趙 成 植 (印)

委 員 金 中 燮 (印)

委 員 宋 炫 善 (印)

濟州大學校 通譯大學院

2006年 12月

目 录

第一章 ‘最韩国的’ 能否成为 ‘最世界的’

1. 普遍性是不存在的

- (1) 普遍性的虚构性
- (2) 大海不是蓝色的
- (3) 如果普遍性能够成为可能的话?

2. 将 ‘最韩国的’ 世界化。

- (1) 香港电影的成功秘诀。
- (2) 韩国的特殊性
- (3) 美国化就是世界化。

3. 结论

第二章 “认同”的判断标准

1. 固有性

- (1) 根源情结
- (2) 双重标准
- (3) 固有性的意义

2. 创意性

- (1) 什么是有创意性地接受？
- (2) 本土化的含义

3. 判断认同的标准

- (1) 现在性
- (2) 大众性
- (3) 主体性

4. 结论

后记



第一章

‘最韩国的’能否成为‘最世界的’

我们韩国一直处于世界的边缘，30年前才开始接触并认识世界。在此之前我国韩国一直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十几年前才实行出国旅游自由化，可见过去一直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当初我们韩国为了解决国民的温饱问题走向了世界，并逐渐认识到只有向世界出口才能保障韩国的未来。从此以后，“全球化”这一口号开始席卷韩国。同时，“与世界各国展开竞争”，“学习英语”等口号也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引导全球化的指南，那就是“最韩国的就是最世界的”。大多数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几乎都强调这一意识形态。如何制造全球化的电影或产品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把最富有韩国特色的东西全球化”。也就是说“最韩国的就是最世界的”。我想在这里提一下这一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如果存在“最韩国的”，那么它成为“最世界的”可能到底多大，其根据在哪里？全球化的正确的含义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应从区别普遍性的和世界性的做起。

1. 普遍性是不存在的

(1) 普遍性的虚构性

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要恢复人性。意思是说，在迅速的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崇高的价值-伦理和道德。同时，人性的丧失也带来了精神的荒废。因此，如果我们要享受更好的人生，我们必须恢复人类的本质。也就是说要恢复人性。这样的人性恢复运动，我们从林权泽导演的电影观中也可以看到。他说他的电影追求人本主义。也就是说与其强调意识形态和韩国的特殊性，不如追求更高尚的人类的普遍价值-人本主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恢复人性是我们生存的必由之路。因此，有了人性恢复运动，同时，《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雷恩》等电影也被评为人本主义电影。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深入思考‘恢复人性’这一口号吧。其实我并不理解这一口号的意思。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要恢复的对象-‘人性’指的是什么？所谓人性是什么呢？是“像一个人”吗？那么，什么是“像一个人”呢？是人类的本来面目吗？还有，人类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是原始人的面目吗？如果都不是的话，那么，是指一个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吗？如果是，那么，其特点是什么？是人类有理智吗？是人类有目标吗？是人类使用工具吗？还是人类具有自我意识吗？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之所以不能正确地理解人性，是因为人性是指人类本质的属性，但让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人类”。我们的确看不到“人类”。我们看到的只是像小张，老李等这样的个人，而不是“人类”。我们可以理解的，体会的小张是的人性，更明确地说是小张个人的属性。但我们没有看过“人类”，因为“人类”这一词语是个抽象名词。举个例子，一个孙子为了让奶奶看看大学，他带着奶奶到大学，并给奶奶说明这里是教室，图书馆，主楼，以及体育场等建筑。走遍了校园后，奶奶问孙子‘那么大学呢？大学在哪儿’？在此，奶奶犯了“范畴的谬误”。也就是说，奶奶产生了错觉，她分不清抽象名词-大学和具体名词-体育场的区别。她想看抽象名词的大学。但我们不能接触到，也不能看到抽象名词-大学。

那么，人性呢？上面提到，在世界上只有存在像小张，老李，这样的个体。这样的个体是我们感觉的对象。我们可以接触到，看到它。但把个体抽象化的概念-男性、女性不是一个感觉的对象，我们虽然不断的讨论理想的男性和女性，但这只是一个抽象的讨论。就像在心目中的理想男性一样，抽象的男性只存在于我们的脑子里。因此，如果你在抽象的男性和实际的男性之间产生错觉的话，别人会把你看作一个精神病患者。由于人类是比男性,女性的概念更抽象化的概念，是一个把男性,女性的共同属性在我们的脑子里抽象化的概念，因此，我们更难理解“人类”这一概念。再说，理想的男性和女性是个很难理解的概念，何况人类这个概念呢？话说回来，我们对抽象化的“人类”的性质又理解多少呢？关于一棵树的性质和属性，我们很容易回答。因为，树是一个可以感觉的对象，我们可以具体地回答。但我们对高度抽象化的人类的性质能说什么呢？如果要说的话，它只是自己的愿望而已。也就是说，这只是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愿望。

如果说，人性只是一个存在于脑子里的抽象名词，那么包含人性的所有话语只具有抽象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使用“人性”这个词，就以为在世界上实际存在着这一东西。即使我们大声呼唤‘恢复人性’，但世界毫无变化，这是因为实际上人性这个词在世界上起不到任何作用。“抓住越狱犯申昌源”这句

话里所提到的“申昌源”是实际存在的个体，因此，能够传达给我们切实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一看这句话，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同时，我们知道确认“申昌源”的方法，使我们能够采取行动，因此，这句话毫不空洞。但“恢复人性”这一口号是没有内容的，是空洞的。没有人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一口号，也就没有人采取行动。人性，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无法理解其含义。

(2) 大海不是蓝色的

我在小时候画画儿时总是把大海涂得蓝蓝的。因为，我的记忆里的大海是蓝色的，还有，老师也在课堂上讲大海是蓝色。但后来，我到洛山寺看大海时发现大海可以变化出好几个颜色。如果在天上蒙上一层乌云，大海就变成黑色。如果是晴天，大海就变成蓝色。大海随着天空不断变色。我再也不认为大海是蓝色的了。如果想知道大海是什么颜色，就要看天空的颜色。天空的颜色就是大海的颜色。

我认为世界是个体的集合，而不是普遍性的集体。在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是个体。存在的基本单位是个体。我们为了方便区分个体的世界而引进了抽象概念。也就是说使用抽象概念来区分和整理世界。被区分的世界让我们感到井然有序，而且舒服。这是抽象概念馈赠我们的礼物。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反馈给他们跟个体一样的地位。普遍概念作为抽象概念只能带给我们便利而已。其实，所有大海的颜色都不同，因地而变。只是我们为了方便而使用抽象概念而已。

如果，世界只是由个体组成，那么，普遍或普遍性的地位将是很明确的。普遍的事物只是一个把个体抽象化的概念而已。它不同于桌子和树的存在方式，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概念里。我是一个支持这些观点的“唯名论者”。从唯名论的观点来看，普遍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再加上，它不是组成世界的实际组成因素。它只是一个名称，有时使用于口号中。如果世界只是由“个体”组成的，这句话是正确的话，我们与其使用“恢复人性”这一抽象的口号，不如使用‘把小李教得像人’这一更具有说服力的口号。我承认“教得像人”也是一个抽象概念，但它更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口号。

如果普遍性只是一个名称，我们就不应陷入这一名称的陷阱里。我们祖先对名

称过于执著。但目前这一情况依然一点儿也没变。人们为了给子女起个好名字费尽心机。如果父母希望子女将来成为富人，而给子女起名叫“百万”，那么，他们真的能成为“百万富翁”吗？名字叫“纯净”的女孩儿能够永远“纯净”吗？没有人这样认为。“普遍者”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普遍的价值”是存在的，那么，它会产生相应的普遍价值吗？追求包含人类共同愿望的普遍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有“普遍性”这一词语，在世界上真的存在“普遍性”吗？绝对不是。因此，我们要警惕“普遍性”这一名称的陷阱。

(3) 如果普遍性能够成为可能的话？

几千年以来，哲学论证一直没有在“普遍价值”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哲学家一直没有就“真实存在”得出结论。一直没有取得令人稍感欣慰的成果，依然处于争论之中。现在“真实存在”这一问题看上去已不属于哲学家们的话题。现代物理学界正在寻找物质的根本。在世界上存在的是什么呢？“存在”的基本粒子是什么？这不都是物理学要解决的问题吗？如果，哲学家在这里插手，顶多是能成解说者。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什么样的才是正确的认识方法？这一问题好像已经列入自然科学的领域。在现代社会里没有人关心哲学家所说的那些认识的方法和正确性。

从认识论热衷于探讨的“真理论”来看，什么样的真理能够拥有普遍性的条件而得到人们的认同？伦理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什么样的伦理道德能够超越时代和人种得到大家的共识？如果其可能性极低的话，那么，关于人类思维方式和形式的普遍性的探讨是否具有可能呢？但20世纪发生在逻辑学的各种流派和领域之间的纠纷，否定了新逻辑学成立的可能性。如果在此引进东方逻辑学的话，普遍性的可能性将会从伦理学里消失。我觉得在哲学里很难寻找到普遍性。

那么，普遍存在的可能性消失了吗？我相信在自然科学里能够寻找到其可能性。让我们听听一个物理学家的意见。裴杰斯(Heinz Pagels)是这样说的。第一，自然界的不变秩序是唯一的普遍存在的一贯秩序。第二，如果我们确信存在科学理论的话，那么其他任何事物都是这一一贯秩序的结果。被人类创造的其他形式的秩序，如法律，宗教，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艺术本来就不是自然界的物质性秩序的结果。我们无法利用任何科学理论证明其中包含稳定不变的秩序，被

人类创造的秩序体现在历史上的是因人类的认识而变化的人为的系统，即信任、愿望、想法。因为这是被人类创造的秩序，所以才能被人类理解。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才有普遍性，而人文学不可能有普遍性。其主要理由是人文学把具有历史性的人类意识系统作为研究对象。我也同意他的意见。举个例子。对所有人类来说，死亡是普遍性的现象。也就是说所有人类都会死。但死亡的意义不具备普遍性。因宗教而变，因时代而变，因历史而变，其意义五花八门。虽然死亡是普遍性的现象，但其意义不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呢？对此，我也同意裴杰斯（Heinz Pagels）的看法，也就是因为，意义具有历史性。也就是说，意义总是具有超越个人的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历史性。还有，历史可分为集团历史和个人历史，在同一集团内部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历史，因此，虽然在同一个集团，但其意义对每一个人不同，而事实也是这样。

以历史性的意义为对象的哲学如何确保其普遍性呢？哲学与科学不同，不以世界的结构为直接对象。哲学只能以世界的意义为对象。这是英美分析哲学家所提供的启示。如果分析承载意义的工具-语言，那么，能够解决并揭开一些哲学问题。但他们的试图最终无果而终。他们体会到语言比想象还复杂和灵活，因此很难把握。他们试图通过语言分析来简化传统的哲学问题，但未能实现。他们领悟到哲学的工作工具-语言，其实超出了我们探讨领域。因此，他们开始重视其他领域，尤其是科学领域。因为，只有科学才能够提供传统哲学所追求的普遍性。

意义获得“普遍”的唯一可能性是找到其物理基础。如果把意义的物理基础-神经细胞状态作为其基础分析，虽然表面上存在差异，但我们可以认为同一种神经细胞的状态代表同一意义。比如，‘水’和‘water’指的是一样的对象，但由于历史性原因，其意义也不同。虽然如此，如果两者都处于同一个神经细胞状态，那么可确定这一两个词语的同一性。我认为水和water不是位于同一个物理状态。即使其可能性存在，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让我们看看我们的脑子。脑子里有 10^{11} 至 10^{12} 个神经细胞，每一个神经细胞里都有几十万个突触（synapse）。突触（Synapse）跟其他神经细胞连接，一般来讲，几千个突触（synapse）跟一个神经细胞连接。因此，我们脑子里存在大约 10^{15} 个突触（synapse），如果说每一个突触（synapse）存在起码两个状态（遏制或刺激），那么，我们的脑子有 2^{1212} 个状态。这一数字显示出互不相同的脑子状态的总数，也显示出人类不同经验的实际可能数量。这一数字超过宇宙地平线内的原子数量，也超过超级电脑可计算的数量。因此，在物理性状态下确保意义的普遍性是不可能的。

我们常说的所谓普遍价值是无法利用上述的理论来证明的。所谓价值是指一个意义的问题，没有物理性的基础，就无法获得普遍性，而其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在讨论‘最韩国的’的同时，也在讨论世界化和普遍性的问题。还有，我们在提到‘最韩国的东西’的时候，总是强调这不是国粹主义。但最终主张我们要把韩国的东西发展成为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如果上述的论证是对的的话，这类主张将是毫无用处的。我们怎么能追求不存在的普遍价值呢？人们总是毫无新意的反复强调，把‘韩国性的’价值升华为普遍价值，才能使‘韩国性’的东西得到发展。这样的结论能否带给我们具体信息？反而是在否定普遍性时更能显示韩国的特点。

2. 将‘最韩国的’世界化

(1) 香港电影的成功秘诀

如果说是“普遍性”只是一个名称而已，而且没有实体，那么，人类的普遍价值和美丽也只是名称而已。也就是说，我们正在梦境奔波。举个例子，在实际生活上我们经常使用世界化这一词语。但是如果说世界化是指普遍性，那么，它仅仅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吗？没有实体吗？但如果说我们经常使用的词语实际没有含义的话，这会让人觉得不以为然。那么，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一词语世界化的含义是什么？几年前我们韩国把世界化问题作为国政指标。当时很多人围绕世界化问题议论纷纷。甚至连世界化的英文标记问题也争论不休。也就是说，世界化的英文用Segyewhua来标记好，还是用Globalization来标记好？问题的关键在于世界化意味着什么？最终，“世界化就等于开放”的主张占优势。意思是说，我们若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我们必须果断地抛弃封闭政策并采取开放政策，同时，把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国。也就是说，该开放的就要开放，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地向世界各国出口。但世界化这一口号跟新农村运动不同，它离我们渐渐远去。为什么呢？从单纯的口号来看，两个之间没有很大的差距。“世界化”和“过得好”都是抽象化的词语。怎么生活才是“过得好”呢？但大部分的国民都理解了这个词。是赚得够，吃得饱，睡得香的意思。不必宣传口号，大家就很容易地接受了这口号。那么，为什么世界化不能带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呢？

世界化是具有限制性含义的普遍性。如果说，普遍性超越时间和空间，那么世界化则暂时保留时间性。世界化不受到空间的限制。区别这两个概念是有一定意义的。导演总是想创造一部空前的杰作，超越时代、人种、地区，同时，能够带给

人们感动的作品。作品要获得成功，首先，要不受人种和地区的限制，得到大家的认同。也就是说，在先得到世界性后，要等待时间。作品在下一代人那里也能够得到认同，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知道。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作品也应带给上一代人同样的感觉，因为，所谓超越时代是指在任何时代都能得到认同，包括现在、未来、甚至过去。当然，这看起来，可能性不大。《宾虚-Benher》作为一部杰作要得到普遍性，那么，要感动古代埃及艳后以及中世纪的修道士。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难摆脱这一限制。因此，我们现在能够追求的只有世界性。

那么，超越地区的世界性具体是指什么？举一个香港电影的例子。上世纪50年代，香港电影还落后于韩国。导演申相玉导演韩国-香港合资电影，申荣均出演香港电影 在香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香港曾羡慕过，也模仿过韩国电影。但到80年代香港电影席卷了韩国。以周润发为首的香港动作片受到韩国青少年的青睐。甚至为了进口尚未完成的电影，不惜签署合同支付更高的金额。香港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香港的战略是什么呢？香港面积狭小，也没有特别的历史遗产。访问香港的游客只关心购物时是否免税，并不关心当地的历史遗产。在狭小的城市里，只有高楼林立金融街，陈旧的住宅区。在这样脆弱的环境下，香港开始挖掘世界各国都普遍喜欢的素材，同时，把它特性化。香港选择的素材就是动作片。世界各国人民都喜欢包含性爱、武打、爱情、探险等的素材。香港考虑到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制约因素，才从中选择了武打片。经济方面的制约是指制作费用。因此，他们喜欢成本低的素材，还有，他们排除性爱，因为性爱电影放映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其商品价值极低。因此，香港选择了中国大陆传统的武术，把武术作为他们电影的主要题材。中国是传统的武术国家。我们小时候读过的许多武侠小说的背景都是发生在中国。因此，武打是香港文化内在的基础。他们把它推上舞台。这一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果。香港的武打片在世界各国都受到欢迎。世界各国人民都认为香港电影就是武打片，自然而然的这一想法深入人心。李小龙和成龙成为世界明星。他们是香港电影的代表。他们是香港的象征。

当然，我们不能说武打是唯一认同香港的方式。香港具有很多属性。其中哪一个属性对认同香港起到主导作用还有待讨论。但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不可否认香港电影界把武打作为他们电影的象征。也就是说，武术作为认同香港的主要特点之一在进军世界市场上起到主导作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那么，我们应当拿什么样的特点来进攻世界呢？我们是否努力过？如果有，其结果如何呢？我们常说

‘最韩国的’就是‘最世界的’那么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2) 韩国的特殊性

‘最韩国的就是最世界的’几乎成为韩国的文化政策的基本战略。那么，让我们分析这一口号吧。‘最韩国的就是最世界的’这一口号可以解释为两个意思。第一，‘韩国性的’就是‘世界性的’。也就是说，‘某某东西是韩国性的’这句话是‘什么是世界性的’的充足条件。意思是说，要成为“世界化”，先要满足成为‘韩国性的’要求。但只要举个例子，就知道这一解释有问题。韩国结的制作方式是‘韩国性的’，那么，这就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吗？还有，伽倻琴是‘韩国性的’乐器，但也不能马上成为‘世界性的’。因此，我们不能把‘韩国性的’就是‘世界性的’这句话解释为‘韩国性的’就是‘世界性的’充足条件。

第二，这一口号在逻辑上没有充分根据，它所表现的只是我们的愿望，而不是逻辑关系。也就是说，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我们应该开发最有韩国特色的东西并出口海外市场。这就表明了只有向世界各国出口才能生存下去，这才是我们韩国所应采取的战略。这一战略要注意下面两点。第一，我们要深入思考开发哪一种产品。第二，我们要慎重设定世界化的标准。这两点是互相连系的，因此，需要按顺序进行研究。

我们在‘韩国性的’东西中要开发哪一个，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是否真的存在‘韩国性的东西’？第二，如果‘韩国性的’存在，那么，要突出哪一特点？我们下面要提及是否存在‘韩国性的’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先假设有‘韩国性的’特殊性。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普遍”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只有特殊者存在。但我们讨论的对象是韩国集团的话，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韩国不是一个特殊者。特殊这是指构成韩国的个体元素，如，小李、老张、以及小李和老张画的这幅画儿，那幅画儿，还有某某唱的这首歌那首歌，还有某某导演的这部电影那部电影等等。因此，我们若要找到韩国的特殊性，那么先要寻找各个领域的共同属性。如果，存在共同属性，而且数量也很多，那么，什么样的共同属性能够更好的表现韩国的特殊性呢？。对此我们常提到的是‘悲情(han)’。我从小就学习到的韩国情绪就是“悲情(han)”。在民谣，清唱（也叫做版索里）文学作品等里，我们都发现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悲情。举个例子，金素月（韩国的诗人）的诗符合我们韩民族情绪，金素月诗的特点就是很好地表现出了韩民族的悲

情。但我们在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和闭幕典礼上演出的节目，与韩国情绪-“悲情”相差甚远。从鼓声和扇舞里很难感受到“悲情”。在四物戏中能感觉“悲情”吗？那么，金弘道（韩国朝鲜时代的画家）的绘画又如何呢？我在金弘道的绘画里感到幽默和讽刺。可以这么说，金弘道的绘画表现的是与世界的融合，是摆脱自身束缚的自由，而不是“悲情”的内在美化。他的画里隐藏着讽刺，但我们很难从中感到悲情。如果这样一一研究寻找各个领域的共同属性的话，那么，把其属性‘世界化的’想法从理论角度看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达成共识呢？还有，原则上的共识是否可能？其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我们在现实中可以选择的战略就是要先找到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的属性，即能够成为世界化的东西，然后，在韩国的东西中寻找该特性并开发该特性。也就是说‘韩国性的’不是世界性的，而是要先找出世界化的普遍属性，然后，在韩国寻找其属性。意思是说，我们要挖掘隐藏在韩国的世界普遍属性。如果，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不应该说‘韩国性的’就是世界化的，而是要挖掘隐藏在韩国里的世界性的东西，这才是更切实可行的方案。

错误的方向是我们韩国电影在进军世界时惨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用‘韩国性的’东西来进军世界市场，这是错误的方向。我们要效仿香港，他们采取的是把“世界化的”反映在香港电影里。我们却没有根据的只是主张‘韩国性的’能够成为世界化的。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有道理。真实存在的是‘韩国性的’，也就是说，这里只有特殊者，因此，把这一特殊者的共同属性世界化，这句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韩国性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韩国的特殊性到底是什么，对这一问题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战略怎么能取得成功呢？因此，从现实来看，把世界化的属性装在‘韩国性的’框架里，这一战略的成功率更高一些。

但是我们在说韩国的特殊性时，总是立足于韩国的精神和情绪。“悲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我总觉得韩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情绪和精神上，还在于表现形式上。也就是说，韩国特有的表现形式不仅是一个反映韩国特殊性的载体，也是一个‘韩国性的’主体。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考虑内容的同时，也要考虑形式。中国的动画片是个很好的例子，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就展出了能够与好莱坞相媲美的新动画片技术。其内容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的内容，但是更引起人们的瞩目的就是中国化的表现方式。他们使用的是水墨画手法的动画片，用毛笔来突出黑白浓度差异的作品。这些动画片不仅是其内容，其表现方式也富有中国的特色。与此相比，我

们是不是只埋头于‘韩国性的’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主要以萨满教和顺从的女性形象作为电影的题材。但这一努力最终没能取得成果，只是其题材引起人们的好奇而已。在世界电影界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忽视‘韩国性的’表达方式的重要性。韩国的特殊性不仅在内容上，也在于形式上。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就等于本质和实际现象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更具体地说是，如果完全体现本质，那么，本质就会消失，只有实际现象留下来。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体现‘韩国性的’内容，那么，留下来的只有形式。如果这句话是正确，我们现在的尴尬局面可以归咎于没有充分体现内容。也就是说，内容和形式没有得到充分协调，因此产生了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我们依然讨论‘韩国性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尚未制作出能够充分体现韩国性内容的作品。我们只是在努力通过解释来弥补其不足。

(3) 美国化就是世界化。

上面提到我们先要把握世界性是什么，然后，在韩国寻找其属性，这是更具有可能性的世界战略。但上面又反复提到‘世界化’没有实体，只是一个名称而已。那么，世界化到底是指什么？如果存在的只有特殊者，那么，世界化这一词语就没意义。在上面提到世界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普遍性只有抽象的概念，而没有实体。因此，世界化这一词语是一个抽象概念，而且是为了人们使用方便而产生的词语。由于世界化指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其实没有实体，因此，我们只能从现实中找出它的含义。虽然世界由160多个国家组成，但世界化这一词语并不意味着包括所有国家。我认为“世界性”这一词语是指一个特定的国家。也不能排除这一词语可能意味着一个特定的地区，但是，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的指标，是世界的基础。上述的特定国家一定是一个强国。因为，强国的决定驱动世界，进而支配世界，强国的意志就是世界变化的动力。那么，今天哪一个国家是世界强国？当然是美国。美国是世界唯一的强国，因此，我们对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这句话并不陌生。因此，所谓“我们希望能够世界化”的这句话，其真正含义就是想得到美国的认同。也就是说，得到美国的认同，就能够得到世界的认同。

小朋友们经常说将来要成为世界级科学家。这些学生好像真地希望能够成为得到世界认同的科学家。也就是说成为世界各国的人民都知道的科学家，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刚果，蒙古以及亚马逊的人民都知道的科学家。但这是不可能的。全世界人人都知道的科学家真的存在吗？非洲马里的人们可能不知道爱因斯坦，也不必知道爱因斯坦。因此，如果上述提到的学生成为著名的科学家，这意味着他成为在

美国著名的科学家。但在美国成为著名的科学家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成为在美国部分科学家之间有名气的科学家。因此，如果正确地解释小朋友的希望，那么，可以这样理解，我希望将来成为能够得到美国部分科学家们认同的科学家。因此，世界化只是一个美国化的另一个表达而已。也就是说，人们一边说世界化是普遍化，一边把美国化当作世界化。总之，所谓“世界化”只是一个“美国化”的修辞表达而已。

如果说美国性就是世界性，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如果说美国性是指美国的特殊性，那么，其特殊性是什么？其特点是什么？韩国具有特殊性，美国也同样具有特殊性，我们都同意这一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特殊性就是世界普遍性的基础。也就是说，美国化的就是世界化的。那么，美国的特殊性是什么？我们不必回答这一问题。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美国或许也会为什么是“美国性”的问题而苦恼，但却不必为了让自己的特殊性获得普遍认同而费尽心机。与此相反，我们韩国总是为了消除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而努力。也就是说，韩国要寻找能够协调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的方法。因此，我们不应倾向于哪一部分，而要寻找既是‘韩国性的’，也是“普遍化”的东西。这一要求可以解释为我们寻找既是‘韩国性的’，也是“美国性”的。为此，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寻找‘韩国性的’，第二，寻找“美国性”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先寻找‘韩国性的’，然后，再将其改造为‘美国性的’，或者是把‘美国性的’东西以‘韩国性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者是寻找‘韩国性的’和美国性的共同属性。但我们一直没有为此付出努力。美国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学是研究‘美国性的’学问。虽然我们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很大程度受到美国的影响，但好像没有对美国进行系统的研究。美国学对我们来说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学科。我们经常听到在韩国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数量超过在法国本土法国文学专业学生。但目前没有一个美国学专业。那么，我们有没有对‘韩国性的’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韩国学的情况也差不多。最近开始设立韩国学，虽然韩国学不必一定要在韩国学科里进行研究，但韩国学的研究方向有许多问题。我们要正视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确认识到世界化就是美国化，如果不太喜欢美国化，那么，就干脆推动法国化，日本化或者中国化。因为，世界化是不存在的。

我们上面提到世界化是‘美国化’的伪装名称。“世界化”这一口号之所以未能带来改变，是因为它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此，我们要接受‘美国化就是世界化’的这一现实，同时，也要讨论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此外，我们还要分析“韩国

性就是世界性”这一口号的含义。总之，可以说，这一口号只是表达了我们的愿望，或是世界化的一个战略。但事实证明这一世界化战略没有获得成功，没有含义，也没有制定出正确方向的这一口号反而成为世界化的绊脚石。我们只是高呼口号而没有付出实际努力，只是从这一口号中得到安慰。如果我们要想确定什么是韩国的认同感，我们就要先制定韩国认同感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说，我们要先确定韩国认同感的判断标准，再着手发掘‘韩国性的’东西。

3. 结论

以上为了回答‘韩国性指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我们对‘韩国性的’和‘普遍性的’以及“韩国性的”和“世界化的”进行了区分。我认为世界只存在个体，我从唯名论的角度看待上述问题。普遍者是不存在的，大海不是蓝色的，什么颜色都不是。不存在普遍性的人类，而只存在个体，如小李，老李等。普遍价值和普遍世界观只不过是为我们使用方便而产生的名称而已。因此，要归结普遍性，要寻找“韩国性的普遍性”这一努力必定会无果而终。我们常说的普遍性和‘世界化的’是指‘美国化的’。‘美国化的’就是‘世界化的’。如果说‘世界化’就是‘美国化’，同时还存在所谓的‘美国性的’，那么，区别于其他集团的‘韩国性’也可能存在。当然作为“世界性的美国化”是存在的，但不能说它是一个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存在。这就像不存在人类而存在着小李，老张等个体一样，不存在普遍性和‘世界性的’，而存在‘韩国性的’和‘美国化的’。在雨天，窗户玻璃会起雾，用抹布擦去霜可以看见外面的景色。如果我们能够区分‘韩国性的’与普遍性或者世界化的，那么，我们就能确定韩国性的是什么。我们一致认为意识形态是个理念问题。在冷战体制下，意识形态让我们想起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当然这也是意识形态，但压抑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这些。最近孔子在我们社会里引起很大反响，这证明孔子对我们社会起到了意识形态作用。性别歧视，大男子主义也是意识形态，“体育能成为国力的象征”这一主张也是个意识形态。看看汉城的街头，天桥，建筑以及墙壁上悬挂的横幅，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横幅。大部分国民都接受过义务教育，但政府还要教育国民。每一个家庭都有电视机，它的用途是什么？我认为我们韩国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给国民。虽然我们看不到，但确实存在影响整个国民生活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立足于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强调韩国的特殊性，但到最后却一定必须要符合普遍性，这种风气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存在普遍性，那么我们不能把他适用于韩国性的特殊性吗？不要‘韩国性的’世界化，而是把具体的，如‘美国性的’、‘日本性的’吸

收在‘韩国性的’之内，这不是更切实可行吗？如果追求不存在的普遍性，那么就会出现妥协的结果。看看已经复原的南大门和昌德宫，他们使用混凝土来进行复原，这能说是‘韩国性的’吗？我们的世界是个体的世界，如小、老张、这只狗、那只狗、这棵树、那棵树等。如果存在所谓的‘韩国性’，那么它指能够体现在个体上。



第二章

“认同”的判断标准

如果存在‘韩国性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到？这本书不能明确地告诉人们‘韩国性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想要发掘，就要先调查韩国各个领域的共同属性，要查明到底有没有共同属性。这将是个工作庞大的工作，同时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为了寻找各个领域的共同属性，我们先要确定什么才能称得上是“韩国性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制定判断‘韩国性的’标准，这将是探讨‘韩国性的’内容的先决条件。前面我们讨论了韩国认同的本质和韩国的特殊性。本章我们要谈判断“韩国性”的标准，即讨论韩国认同感的判断标准。在提出认同韩国的判断标准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固有性”和“创新地接受”这两个概念。

1. 固有特性

(1) 根源情结

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假面舞是我们韩国的固有民俗舞蹈。假面舞是我们固有的，用来讽刺两班（朝鲜时代支配阶层）的，我一直就是这么理解的。但上高中的时候，看了成龙主演的香港电影，在电影里他戴着狮子假面演出假面舞，这与我们的假面舞差不多。那么，我们的假面舞是从中国传过来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韩国的假面舞能否算是固有的，我开始出现疑问。即使假面舞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但经过了变化和创新，那么这算不算是‘韩国性的’？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性，假面舞本来是从韩国开始的，后来传到中国的，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确保假面舞的优越性和固有性。但每当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总遇到根源问题，来源能成为固有性的标准吗？一般认为根源不能成为固有性的标准。如果把根源作为固有性的标准，那么，现在人类文明的固有性也许永远不能摆脱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阴影。今天谁也不能否认法国具有固有性，英国具有固有性，中国

具有固有性。也就是说，实际上，很多固有性认同的对象，我们都不在乎来自何处。休谟曾在200年前说过，虽然法国是最适合种植葡萄的国家，但引进葡萄不到两千年，美国在三百年前没有马、牛、羊、天鹅、狗、玉米、现在，葡萄酒成为法国的象征之一。但据休谟说，在法国种植葡萄只有两千年的历史，那么，葡萄酒怎么能够成为法国的象征呢？答案是，他们利用自己的种植方式，还拥有自己的酿酒、保存、管理、流通方式，虽然葡萄是从海外传过来的，但法国却能够保持葡萄酒的固有性。也就是说，葡萄酒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如果后者发展出自己的葡萄酒，这一葡萄酒就能够成为后者认同感的对象。

就这一问题韩国著名作家赵芝薰曾提出了高见，他是这样说的，韩国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这句话是来源于两个误解，其一，对文化乃至思想这一词语的本质有误解，其二，对固有性和民族个性这一概念的误解。第一，所谓文化和思想的本质就是移动和融合，在这一移动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个性就是固有性。也就是说，把人类的普遍生活和思考方式改变为民族个性，这就是所谓文化和思想的意义所在。第二，“固有的”并不是“本来就有的”的意思。虽然有相同的部分，但仍然有差别，在别处找不到的，这就是“固有的”。因此，固有思想，并不是本来就有的思想，而是今天有个性和主体性的思想。也就是说，在人类普遍思想里，“韩国性”的存在方式或者在韩国民族风情的环境中经过同样的历史磨练和生活过程而产生的对事物的共同看法，就是韩国的固有思想。这句话无可挑剔，完全正确。对“固有性”来说，根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性的问题，独立的个性就是固有性。

如果说固有性不是根源的问题，而是个性的问题，即，如果说独特性既是个性又是固有性，那么，在判断是否具有“韩国性”的时候，我们不必考虑根源的问题。不管发源地在哪里，发明者是谁，更重要的是是否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我们再也不必为根源情结而苦恼。无论其来源，只要它具有我们韩国的个性和独立性，它就是“韩国性的”。在饭馆招牌上经常看到的“正宗”、“元祖”等词语起不到什么作用、最终消失的时候，我们对根源的情结也会随之消失。

(2) 双重标准

如果固有性是指不同的个性，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固有性就是认同感，因为对韩国的认同感对象是指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韩国性”的东西。但我们是不是为了确

定认同感而用双重标准来衡量固有性？我认为需要对此认真思考。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对固有性这一词语的概念真的正确理解了吗？因为，如果说固有性是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的个性，我们就要先看看我们是如何使用“固有性”的，这样才能确定固有性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韩国的历史环境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受中国影响的时期，第二部分，受日本和美国影响的时期。就第一部分来说，毋庸置疑，我们韩国的文化和思想大部分从中国引进的。也就是说，我们模仿或者创新接受中国的文官体制和风俗。韩国的文化通过百济，高句丽，高丽，朝鲜王朝传播到日本，我不清楚事实是否如此。但我们对中国的态度和对日本的态度好象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对从中国引进的文化来说，我们主张这些文化已经“韩国化”了，因此这是我们的，但对我们传到日本的文化，我们主张这些文化来自于韩国，因此，日本应该对我们表示感谢，可是日本没有感激之情，因此日本人是忘恩负义的…。例如我们主张日本的国宝1号是百济赠与日本的。但在面对中国时，我们就改变态度，举个例子，就朝鲜的世宗大王发明的测雨器问题，中国根据测雨器上所刻的年号，主张测雨器是中国的。但我们反驳说，虽然有中国的影响，但这是我们创造的。

如果说在日本殖民统治之前，许多文物是受到中国的影响而得到发展，那么，就像我们要求日本一样，我们也应该感谢中国，但我们没有感谢中国。也就是说，我们用双重标准对待中国和日本，这一双重标准阻碍了我们对认同感的探讨。

从第二部分来说，韩国在受到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又受到美国的影响。我们在开放并引进西方文明时，主要是通过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的，虽然日本为了推进殖民统治而促进韩国的近代化，但日本对韩国的近代化和先进文明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对此并没有感谢日本。因此，每当从日本那里听到‘日本的殖民统治促进了韩国的近代化’等的言论时，韩国就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那么，我们对美国的态度如何？1945年8月15日美国作为占领军开始驻军韩国，美国为了自己的世界支配战略，阻挡了整个韩半岛的共产化，同时，把韩国美国化了。包括教育制度等许多制度和风俗都是从美国引进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美国接触并接受世界先进文化。虽然存在一些反美情绪，但我们对美国态度友好。日本同样带给我们先进文化，但我们依然敌视日本。其根本差异在哪里？是由于一个是殖民统治，一个是占领军统治差别吗？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到底是什么？是新的支配方式？还是支配者的心态？我认为从根本上讲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美国只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已，

在二战结束后殖民统治逐渐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不能继续维持过去的殖民统治，假设说对调日本和美国对韩国的统治顺序，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美国对韩国实施殖民统治后，日本接着在韩国驻军，那么，我们会憎恶美国，感谢日本吗？我认为不管他们的统治顺序如何，他们都会对韩国采取同样的政策。因此，我们应该拿着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两国。但我们却依然用双重尺度对待他们。

变色龙有自己的固有颜色吗？变色龙根据周围环境而变色，因此，我们很难说他的固有颜色是什么。同样，我们虽然不象变色龙那样变化无常，但我们的双重尺度阻碍韩国认同感的确立。假如面对同样的情况，采用同样的尺度，那么，我们会更容易确立韩国认同感。但如果我们继续使用双重尺度，我们很难确立我们的韩国认同感，就像很难确定变色龙的颜色一样。今后我们要使用的尺度是可以同样用于中国，日本，美国乃至我们韩国的。这就是独立性和个性。对日本文化来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接受韩国文化并加以日本化，而文化的来源并不重要，即谁传播文化，谁接受文化这一问题并不重要。韩国的文化影响了日本，同样，中国的文化也影响了韩国。那么，个性具体是指什么呢？

(3) 固有性的意义

如果说“固有性”和“个性”是同义词，那么，探讨认同的过程就是确认固有性或个性的过程。个性是只有某个体才有的特性，是能够让该个体区别于其他个体的独有的性质。更严密地说，所有的个体只具有数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只是跟自己同一。韩国是个集体，因此，我们在探讨对韩国的认同时，应该探讨对集团的认同，而不是数的同一性。那么，韩国的个性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举个例子，朝鲜的山水画看起来，跟中国的山水画没什么区别，但韩国的山水画肯定有固有的特性。其实我区别不了中国和韩国的山水画，我在台湾的国立博物馆里看中国山水画时，我还以为我在首尔的国立博物馆里。虽然韩中两国的山水画的背景都是桂林，但专家们肯定会找出能够区别两国山水画的特点。其特点可能在内容上或者在技巧上，肯定存在能够区别韩国和中国山水画的特点。但我们说韩国山水画具有“固有性”和“个性”时，并不只是意味着韩国山水画具有区别于中国山水画的属性，同时还意味着，韩国山水画必须具有一定的美。

在韩国有许多模唱歌手，赵容弼（韩国歌星）的模唱歌手是赵永弼，赵容弼和赵永弼肯定不同，虽然在音色和唱法方面有类似之处，但他们的歌曲肯定不同，这

并不意味着赵永弼唱得不好，但我们不认为赵永弼具有个性和固有性，是因为他只是尽力模仿赵容弼唱歌而已，而且他无法模仿出赵容弼的原汁原味。即使是模唱，但如果他创造出一定的美，那么，我们会认为他的歌曲具有个性。车重乐（韩国歌星）曾唱过猫王歌曲，但车重乐唱的这首歌具有一定的美，因此，这首歌能够成为车重乐的代表歌曲。

个性具有能够区别于其他的属性，同时，具有一定的美和品位。让我们看看非常精巧的赝品，我们经常从国际新闻中听到在世界著名博物馆里的作品被判定为赝品的新闻。这是专家们也看不出来的赝品，这些赝品和正品肯定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连专家们也分辨不了的类似属性。因为它们的物理属性几乎一致，我们可以说它们的美感也几乎一致，也具有一定的美和品位。那么，这些伪造品是不是具有个性？精巧得不能分辨的赝品和正品之间只是存在创造者的差异，而没有其他的差异。那么，“作品是否是由创造者创造的”这是判断正品的唯一标准吗？许多人都同意这一看法，我也同意这一看法。但是我们需要对此作进一步的思考，上面我们提到固有性并不是来源的问题，也就是说谁最早发明的，这跟固有性毫无关系，因此，对赝品而言，谁创造作品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赝品是否具有区别于正品的属性。复制品最大限度模仿正品，很难找出能够区别于正品的属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承认赝品具有一定的美，但我们不能承认赝品具有能够区别于正品的个性，总之，赝品没有自己的个性。

韩国以伪造品天堂臭名远扬，当然伪造和剽窃是非法的，也可以说是偷窃的行为，因此，我们不应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这不仅仅是偷窃的问题，更是一个认同的问题，因此，我们更不能容忍伪造和剽窃问题。模唱歌手赵永弼也许永远不能具有自己的个性，只会模仿赵容弼。手里提着伪造古姿手提包的人可能没有机会为买什么样的国产手提包而伤脑筋。习惯于剽窃日本歌曲的歌手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心创造自己的歌曲。也就是说伪造品和剽窃让我们失去了为人同我们而努力的机会，即抹煞了我们的个性。个性是区别于他人的属性，但是模仿不具有个性，总之，没有个性就没有认同。

在我们韩国有个难以理解的事情，那就是一方面清算日本残渣的呼声高涨，但另一方面我们习惯于剽窃日本文化。清算日本残渣的意义在于恢复对我们韩国的认同，我们主张在日本殖民统治之前韩国保持着对自己的认同和个性，但日本为了抹煞我们的个性而实施创氏改名以及日本化的政策，从此我们开始失去了我们的品味

和良风美俗，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清算日本残渣恢复对我们的认同。但另一方面我们热衷于剽窃日本电影、歌曲、电视节目。在韩国受欢迎的歌曲有不少是剽窃日本歌曲的，这已经不再是个秘密，还有许多成功的电影也是剽窃日本电影的，尤其是在电视节目方面，受欢迎的节目大部分都是剽窃日本电视节目的。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们一方面拿着抹布努力清扫，但另一方面我们依然随地扔垃圾，剽窃和模仿本身就是犯罪，但更严重的是它在剥夺我们思考认同的机会。这一点我们再三强调也不过分。

2. 创意性

(1) 什么是有创意性地接受？

如果说“固有性”不是根源的问题，而是能够区别于他人的属性问题，还有必须具有一定的美，那么我们必须要考虑创意性。我们经常说如果通过有创意性地接受和发展把一事物变成我们的东西，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对外来的文化产生恐惧，好的就接受，不好的就排斥。重要的是应该具备有创意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力量。这一主张是完全正确的，文化就像流动的水一样，总是从高到低流动，不流动就会腐败。可能没有人反对这一主张。那么，“有创意地接受”到底是什么意思？为此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无论什么东西如果从一个文化圈转移到另一个文化圈难免会发生变化。那么，应该如何变化呢？还有如何区别单纯的变化和有创意的变化呢？

举个例子，围棋最初在中国发明，也许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世界第一。这是因为韩国和日本的围棋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但现代围棋是日本再创造的，如制定新的围棋规则，产生新的布局，举办定期的棋赛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围棋在日本升华为“道”。这可以说是日本的功劳，日本几乎没有改变围棋的基本框架，但出现了把围棋视为生命的品格，当然也出现了新招，更重要的是围棋成为一种文化，这就可以有创意地接受。把一种游戏升华为“道”，这就是一个“有创意地接受”的典范。那么，我们韩国的情况是如何呢？对韩国来说，围棋基本上依然是游戏。虽然专业围棋文化逐渐扩大，而且实力在提高并战胜世界冠军，但围棋人士依然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举个例子，如果曹薰铉（韩国著名的棋手）去世，能享受国葬待遇吗？我认为不行，在我们社会里围棋依然是个游戏。

文化走出国门就会发生变化，围棋也不例外。围棋在日本升华为“道”，而且棋风也有所改变，也就是说，中国围棋重视地盘，日本围棋则主要重视棋形，韩国围棋重视战斗力。在这里讨论哪一个更好，这毫无意义。这只是个棋风的差异而已。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围棋在日本得到了“道”的地位，不再是游戏。这就是“有创意地接受”的典范。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得到这样的地位。以韩国儒教为例，众所周知，儒教来自孔子思想。以孔子为始祖的儒家在中国经历过许多发展阶段和变化。但我们不必特别关注这一点。问题是儒教在韩国如何变化和发展，儒教，尤其是性理学在韩国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以李珥和李滉为代表的性理学发展，如今依然是我们的骄傲。但儒教在一般社会和制度里起到了有效压制民众的作用。儒教的所谓的“礼”产生许多虚文浮礼。凡事“孔子曰”的态度严重阻碍言论自由，成为权威主义的象征。不重视内容，只重视名分，轻视经济，重文轻武，导致国防的弱化。结果，儒家的宗旨，即孔子儒家的意义得不到真正体现，儒家在韩国变成有效控制社会，压制民众的意识形态。举个例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给“管理不好家庭的人不应该从事政治”这一命题提供了依据。首先要修身养性，然后稳定家庭，最后才能治理国家，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根据这一点，有人会主张“管理不好家庭的人不应该搞政治”。但这口号并不现实。孔子也承认‘自己到了七十岁与世俗之间的矛盾才消失（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到了七十岁才做到这一点，那么普通民众呢，终生不能完成修身养性。普通民众怎么能够“修身”后再“齐家”呢？在中国孔子时代就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处”这样的看法。治国人的用处和平天下人的用处是不同的。一般的人把修身和齐家同时进行，有的人把修身，齐家和治国乃至平天下同时进行，这是事实。在中国孔子只是个诸子百家之一。孔子的地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但在韩国孔子的地位等同于释迦牟尼和耶稣，而且他的思想在朝鲜起到压制民众的作用。这就是文化的变形和退步的例子之一。

那么，有创意地接受和退步的标准是什么？从上述内容来看，能否达到普遍价值是一个标准。以围棋为例，道艺比游戏具有更高的普遍价值，提高人权比压制人权更具有普遍价值。不同的文化存在着差异和区别，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遍价值能够存在吗？我认为经验论者可以回答这一问题。跟法国人和休谟时代的人不同，希腊人鼓励“男色”。休谟把它解释为“友情、共识、互爱和诚实的源泉。也就是说，虽然“男色”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而被接受，但“男色”象征的友情、共识、互爱和诚实能够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得到重视。从这种经验论的立场来看，人类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普遍价值是存在的。当然，这一普遍价值不是实际存在的，而只是

存在着抽象的名称。但我们在制定目标或评价时，为了方便而使用普遍价值这一表达方式。“有创意地接受”也不例外。“有创意地接受”的标准是人类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一般性价值。虽然我不知道“道”是否真的存在，但像曹薰铉一样把围棋当成“道”的人是肯定存在的，虽然我不知道“人权”是否真的存在，但肯定存在着受到压制的个人。

(2) 本土化的含义

如果“有创意地接受”的标准在于体现普遍价值与否，那么，我们必须研究与普遍价值对立的本土化问题。本土化问题在维新时代（韩国总统朴正熙的独裁时代）闻名全国。也就是说当时“韩国式的民主”这一口号席卷全国，这一口号的意思很明确，即美国的民主主义不符合韩国的国情，因此，我们要实施符合国情的民主主义，尽快发展经济，有效应对北韓的威胁，为此，我们需要制约部分人权，此外，为了节约选举费用在体育场实施间接投票。维新体制是独裁体制，因此，引起民众的强烈反抗。“韩国式的民主”中的“韩国式”包含本土化问题。我认为本土化问题跟“认同感”问题一样，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韩国著名作家金东里在他的小说“巫女图”里提到这一问题，他提出两个价值体系的冲突，就是作为巫女的母亲和作为基督徒儿子之间的冲突。基督教具有普遍价值，萨满教也有自己的世界观，问题是两者互不相容，什么是确保我们认同的方法呢？对此，小说里以“杀人”这一物理的方法作为结束。但在现实中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过去我们在接受基督教这一外来文化时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基督教中，把“牺牲”叫做“殉教”，但对本土文化而言，这是侵略行为。因此，问题不是作为外来文化的基督教如何保持原型进入韩国，而是如何与本土文化融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小说里的“杀人”并不是我们要采取的方法。我们在现实里，不得不接受外来文化时，应把它本土化。

本土化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直接接受原型，但改变内容，基督教是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在韩国发展成为最主流的宗教之一。每到周末大型教堂前车水马龙，警察费劲地疏通。基督教还拥有电视台和报社，其影响力极大。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最典型例子就是把圣诞节定为假日这一事实。目前基督教在韩国已经占有主导地位。但在韩国基督教的内容如何呢？虽然我们采取西方式的建筑，礼拜顺序以及司祭制度，但没有人否定韩国基督教是“祈福信仰”这一事实。信徒

们都是为了“祈福”去教堂的，都是为了家庭幸福，事业成功而捐款的。因此，如果家庭成员遭遇不幸或事业失败就会对信仰产生怀疑。天堂的幸福不如在人间可见的幸福好。基督教的“爱护邻居”变成“爱护家人”。我们常见圣经的这一句子“如果你得到救赎，你的家庭也会得到救赎”。也就是说韩国基督教没有超越性，韩国基督教已成为祈福信仰。这是因为它受到韩国萨满教的影响，也就是说萨满教吃掉了基督教。外面保持基督教的原型，但从内容上看，萨满教战胜了基督教。韩国著名作家赵芝薰曾说过“我们可以利用在我们文化里内在的萨满教寻找我们思维方式的原体以及接受并改变外来思想的方式。坦率地说，韩国的思想和文化，包括道教、佛教、儒教乃至基督教，都是以萨满教为基础的。

第二，同内容相比，我们更重视形式上的本地化。最近，基督教建议用韩国的传统民谣节奏来唱圣歌。他们认为韩国人不必用西方人的唱歌形式来举行礼拜，也就是说用韩国传统民谣节奏唱圣歌更适合韩国人。就这样，开始演奏伽倻琴唱圣歌。还有人提出在建筑形式上要采取韩国传统形式。他们认为在砖瓦盖成的韩屋里举行礼拜是保持对韩国认同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基督教进入韩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因此，我们需要以韩国的方式举行礼拜，为此，牧师也要穿韩服，面包也要改为年糕，以使基督教本土化，这就是他们的主张。

内容和形式的本土化一般都同步进行，在此，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何定位本土化的主体，也就是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面我们提到萨满教在韩国占有主导地位。但萨满教诞生在远东西伯利亚，很久以前进入韩国。为什么萨满教在韩国能占有主导地位呢？如果这根源不是问题，那么经过几千年后，基督教或是伊斯兰教也可能会在韩国文化起到主导作用。可见，作为本土化核心的精神和文化是可变的。如果存在能够包含多数核心的共同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对韩国的认同。那么，到目前为止萨满教依然主导韩国文化吗？我同意这一看法。萨满教在韩国的影响无需再多做说明也很明显。

那么，为什么萨满教能够成为最终胜利者呢？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容易犯循环谬误。萨满教之所以能够在韩国生存，是因为它符合韩国人的情绪。也就是说它具有与韩国人相配的东西。那么，为什么韩国人接受萨满教呢？这是因为它符合韩国人的情绪。这样问题和答案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萨满教之所以能够在韩国生存，是因为它符合韩国人的情绪，韩国人之所以接受萨满教，是因为它符合韩国人的情绪。如果要截断这一循环的反复，我们需要研究萨满教的哪一特点只有在韩国得到

发展，该特点就是韩国情绪的核心。让人反感的文化或情绪不可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只有深入研究萨满教，才能发现“韩国认同”的一个层面。

3. 判断认同的标准

(1) 现在性

固有性的标准和选择判断固有性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就好像判断长短的标准是尺子，但哪一种尺子比较好，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上面我们谈到固有性和创意性的标准。下面我们要谈如何决定判断认同的标准。如果认同是个性，而个性是固有性和创意性的合体的话，决定判断固有性和创意性的标准就等同于决定判断认同的标准。

我认为为了探讨对韩国的认同，首先要从正在韩国发生的事情出发，关注现在的情况，也就是说“现在性”是判断认同的标准之一。如果目前在韩国发生的现象具有意义或重要性，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一现象作为考察的对象。也就是说，过去的现象不应成为考察的对象。许多人都说“韩国战争之前我在北韩养过金牛”。但只有过去这只金牛与现在有联系时，我们才关心这一金牛，也就是说我们不必把过去的事实作为考察的对象。我们把解决目前的问题时所需要的过去历史列入考查对象，这就是正确的方法。因为与现在没有联系的过去历史只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这对考察我们的认同问题起不到任何作用。以韩国的哲学领域为例，我认为韩国哲学应该是为了解决目前韩国的问题而存在的。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要在韩国搞哲学呢？但是在韩国哲学的名称下所进行的学问里都充斥着元晓（韩国佛教的大师）、退溪（韩国著名的性理学家）、佛家、儒家和道家等内容。韩国哲学不讨论目前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在韩国哲学里我们只能看到元晓和退溪的业绩还有佛教、儒家和道家的发展过程。那些元晓或退溪的思想和哲学与目前韩国的问题有什么联系呢？在韩国搞哲学的人，不管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在元晓或退溪的基础上作研究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元晓和退溪的哲学也许能够成为今日的哲学。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元晓和退溪的哲学的现代意义，只有召开学会时才能找到。如果元晓和退溪的哲学处于韩国哲学的深层，那么，我们不必为了找出其现代意义而苦恼。但如果过去的历史和业绩不存在于我们内面深处，那么，我们大可以把它排除在现在的讨论对象之外。

我们经受的历史断截严重阻碍认同的确立，如果“现在性”是判断认同的标准之一的话，金属活字让我们感到困惑。我们在历史课堂上学到我们的祖先在世界上最早发明金属活字。比西方的古登堡早几年，这也是历史课的重要内容之一。韩国民族在世界上最早发明金属活字，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如果现在性是判断认同的标准的话，问题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因为，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活字体是日本制定、传播的。最近才出现我们自己开发的活字体，直到几年前，我们教科书的活字体都还是使用从日本传过来的活字体，目前大部分的杂志还是使用由日本制造的印刷机，活字也是使用由日本制定的。像这样，我们文字媒体的活字体大部分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我们如何把这一现实和最早发明金属活字的历史联系起来呢？这一问题真让我们感到困惑。韩国在世界上最早发明金属活字，但金属活字的发明没能带来知识的大众化，也没能改变社会，只是使用于有限的范围内，而且与目前使用的金属活字没有多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文化出现了断层。如果我们仍然一直强调我们最早发明金属活字，这不是跟说“以前在北韩养过金牛”一样吗？

但就金属活字而言，弥补断层的方法却很简单，就是重新恢复现在性。任何历史都会存在一些断层和空洞，但我们好像有过于强调这一点的倾向。我们失去了我们活字体，而且没能继承并发展金属活字，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可以拿“龙飞御天歌”（朝鲜时代用韩国语写的诗歌）的活字来与日本的活字展开竞争。哪一个最终获得胜利，这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弥补断层和保持现在性。我想在这里提出两个建议。其一，复原，保持原型。复原的过去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把“龙飞御天歌”的活字体直接用于目前发行的书籍题目或本文内容上。复原是好的方法之一。其二，以原型为基础，有创意地把原型变成新形态，其基础是过去的活字，但加上了现代的感性。选择哪一个都无所谓，事实上同时采取这两个是更好的方法。如果说复原后的“过去”就是“现在”，那么，复原的“过去”越多，现在的文化也会越丰富。

所有有关认同的讨论应从目前在韩国发生的事情出发，这就是现在性的意义。现在性的意义非常重要，我们必要抛弃训诂学的态度。过去对韩国的研究过于强调历史和遗迹的研究。我们一般把它称为对传统的研究。但我认为没有现在性的传统，就会沦为训诂学。我们在讨论对韩国的认同时，必须把所有的讨论跟现在性联系起来。

(2) 大众性

只靠现在性，很难判断认同的标准。因为“现在”里面有许多种类，因此，必须加上什么条件。大众性也是其条件之一。当然，我们必须从“现在”情况开始讨论。那么，我们要把什么作为对象呢？我认为我们要选择“大众化的”。因为，大众化是得到很多人认同的对象，对找出我们的认同标准有很大的帮助。只得到少数认同的东西很难为判断集团认同做出贡献。不管其水平高低，只要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就会更准确地反映我们。朝鲜时代王室音乐雅乐和老百姓唱的民谣，哪一个更能作为探讨韩国认同的对象呢？雅乐是当时支配阶层的音乐，它会具有更高的水平，但我们却把民谣视为更韩国性的东西。一般认为民谣隐藏着韩国热情绪和感性。此外，民间的故事和传说在揭开韩国人的意识结构方面占有更主导的作用。我把这一现象称为大众性问题。离大众遥远的上层高级文化乃至支配阶级文化对探讨集团的认同毫无帮助。获得大众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得到许多人认同的现象更适合我们探讨认同。

只有少数人欣赏的东西，有时也会对判断认同有很大的帮助，但需要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少数人欣赏的东西，不管是以什么形态—原型还是变型，都必须要求大众化。虽然最初只有少数人欣赏，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慢慢地被多数人接受，那么我们可以说它大众化了。也许大多数文化也都经过了这样的过程。因此，我们首先要将目光放在大众性上。在那里肯定有大家都喜欢的，想要的，让大家感到舒服的东西，也就是时代精神渗透在里面。从这一点来看，我国藐视大众文化的程度已经很严重了。几年前世宗文化会馆的委员会由于“租借场地”问题都提出辞意。他们大部分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他们坚决反对把高贵的艺术殿堂世宗文化会馆租借给大众歌手李美子（韩国著名的流行歌手）开演唱会。这些教授们的专业大部分是西方音乐，也就是我们叫“古典音乐”的东西。按照他们的主张，古典音乐是艺术，李美子的通俗歌曲难登大雅之堂。守护艺术是他们提出的名分。我不知道什么是艺术。我所关注的是李美子的歌曲比教授们的咏叹调(aria)更受欢迎。城镇里的阿姨们都是李美子的歌迷，年轻一代也会唱李美子的歌。李美子是国民歌手。像这样，很多人都喜欢和认同的歌曲应成为探讨认同韩国的主要对象。只有少数人欣赏的古典音乐不能成为探讨认同韩国的主要对象。

五十年，一百年后，在小学音乐教科书里会收录什么样的歌曲呢？人们都认为意大利的艺术歌曲或是歌剧的咏叹调收录在教科书里的可能性不大。也许童谣或韩

国歌曲收录的可能性大，但赵容弼的“请回到釜山港”或金贞九的“流泪的豆满江也可以民谣或“大众歌谣”为名称”收录在教科书里。虽然不知道这两首歌曲能够多长时间持续受欢迎，但是这两首歌曲已经受欢迎数十年了，从这一点来看，这一两首歌曲今后数十年也应该能够维持生命力。那么，我们需要分析为什么这两首歌曲是代表韩国的歌。如果分析节奏、歌词和唱法等所有方面，可能可以找出韩国人喜欢的歌曲的特点。目前，我们喜欢西方的大众音乐。西方流行音乐在韩国的音乐市场占的比重比古典音乐还要大。可以说，它虽然不比韩国流行音乐大众化，但比古典音乐更大众化了。如果大众性是判断认同的标准，西方流行音乐也可以成为对象。如果有五十年，一百年后仍然大受欢迎的西方流行音乐，比如说披头士的《昨天》，那么，它应该也能够收录在教科书里，对此，我们也要进行相应的分析。不管根源如何，只要能够确保大众性，就能够成为探讨韩国认同感的对象。但是主张大众性应该成为判断认同感的标准，这句话意味着“所有韩国性的东西都应该得到保存”这一主张将无法成立。也就是说，主张一旦清唱（也叫“板索里”）消失，韩国固有精神也就会随之消失，因此，国家要给予支援，媒体也要支持等等，是错误的想法。发掘我们的传统有助于目前文化的发展，这是很值得提倡的。我们可以选择的東西越多越好，多多益善。“过去的”东西不适合“现代”的可能性很大，因此，由政府来给予支持，这可能有助于形成公平的竞争舞台，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态度。我们好像认为失去了这个，就会失去组成韩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发掘我们失去的传统而介绍给国民，这是非常好的。但做到这一点已经足够了。只有在进行公平的竞争后确保大众性，才能成为我们韩国的主流文化。在我们的文化里，“板索里”大众化了吗？如果没有，是因为机会接触“板索里”而没有人气吗？政府打压过板索里吗？我认为，如果板索里因得不到大众性而失去了它在韩国文化里所占的比重，那么，我们可以把板索里排除在判断韩国认同感的对象之外。如果板索里继续得不到大众的支持，那么，可以说板索里不再是韩国的声音。这样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可以享受其它的文化，那时更符合韩国性的。

（3）主体性

除了“现在性”和“大众性”以外，能够判断固有性和创意性的标准，就是主体性。那么，主体性的意思是什么？主体性是指对待现象的态度，而不是表面上的现象。举个例子，两个人同样在意大利学习意大利歌曲，回国之后，同样举行演唱会，他们都唱一样的歌，唱法也一样，那么，他们之间没有差别吗？从表面上看，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但在态度和意识方面，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说，其中一个人

能够唱原汁原味的意大利歌曲，也尽最大的努力模仿原来的歌，他对此感到自豪。如果他在海外得过奖更会如此。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歌唱得像意大利人一样，接近西方文化，感到满足。他很想成为意大利人。与此相反，另一个人虽然唱意大利歌曲，但不想成为意大利人。他愿意把意大利歌曲介绍给韩国并丰富韩国音乐。即，他想提供意大利歌曲和韩国文化互相融合的机会。他本质上对韩国音乐很感兴趣。我认为这两个人的态度差异就是主体性的问题。

接受一个文化或制度的态度是判断认同感的条件之一。以非常渴望成为美国人的人为对象讨论韩国认同感，是浪费时间。塔木德（犹太教的口传律法集）里有这样的故事，在一个躯体上长出了两个头，那么，我们要把他看成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是认同感的问题，是最根本的认同感，也就是说，要把他看成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问题。对此塔木德这样回答，揪住其中一个头，如果两个头一起哭，那么，是一个人，但如果只有一个头哭，那么，是两个人。这是指态度的差异。也就是说，在判断认同感时，心态和态度是重要的标准。

态度的差异，即主体性是判断认同感的标准，但实际上很难判断什么是主体性。因为，我们以韩国民族和国家为对象进行讨论，但实际上我们无法确认民族这一集团的主体性。民族这一集团是否具有意识？如果没有意识，那么，怎么能采取主体能动的态度呢？现代独角兽队（韩国职业棒球队）具有主体性吗？我们对此很难回答，因为，一个“球队”无法具有主体性。因此，我们要把这一问题改为‘现代独角兽队的选手们具有主体性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在年薪协商中，各个选手采取的态度就是具有主体性的。主体性是个体的态度，而不是集团的态度。

如果说主体性是个体的属性，而不是集团的属性，而且我们把主体性作为判断认同感的标准之一，那么，我们要探讨的就应该是集团各个成员的主体性。只有把握各个成员的主体态度，才能确认集团的主体性。但只看表面上的现象很难确认主体性。比如，这里有认真学习英语的两个人，只靠现象，我们很难说谁具有主体性。他们都使用同样的教材，跟同样的老师学习，学习时间也一样，甚至学习成绩也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区别主体的态度，要看各自的意识。但意识是隐蔽的，因此，很难从表面上看出来。即使是外表一样，肯定存在意识上的差异。例如说，一个人是听别人说学好英语很有好处才学习英语的，另一个人是想了解其它国家而学习英语的。当然第二个人更具有主体性。假设像这样调查了一个人一个人的主体性，几乎所有的人都具有主体性。那么，这个集团或国家就具有主体性了吗？

看起来可能性很大，但如果这样断定的话，可能会犯“合成的谬误”。朝鲜末期，大部分韩国人都有主体性的思考。也就是说，大多数韩国人愿意韩国的独立，而且不愿意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韩国最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来，历史学者们批判说朝鲜对世界列强没有采取主体的态度。现在韩国如果在外交问题上没有采取主体的态度，那么，我们会动辄说目前的情况与朝鲜末期类似，同时，警告说主体性的丧失，就会导致国家的没落。我们曾经经历过韩国国民大部分具有主体性，但国家却丧失主体性的历史。像这样要讨论民族或集团的主体性是很棘手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讨论集团的主体性呢？

我认为应该以“倾向”来掌握韩国的主体性。“倾向”是否存在也是引起争论的问题之一。但“倾向”的一般性意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此，不妨在此使用。“倾向”这一词语大多出现在“一般具有什么、什么倾向”这样的句子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倾向是个体的潜在属性。但这也会引起争论，而且我认为倾向是从我们经常接触的现象里整理出来的。例如说，“巴西人具有喜欢足球的倾向”这句话可以解释为，观察巴西人的行动和对话，就会让我们认为巴西人喜欢足球，这并不是说，喜欢足球的属性存在于每一个巴西人的内心或表面上。我们在讨论巴西人的气质时，总是提及爱好足球，这是指一个集团的倾向。众所周知，是否是足球爱好者是判断巴西认同感的因素之一。因此，我们在这里要阐明的主体性是集团的倾向。集团通过许多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的现象来表达自己的主体性。

4. 结论

李真宇（韩国的作家）的书《韩国人文学的西方情结》中，提及韩国人和韩国文化的认同问题。作家在“韩国人不存在”这一节中说，如果政客想要把我们韩国区别于其他集团，并煽动封闭的民族主义，那么，政客会诉诸于什么呢？毋庸置疑，就是强调我们属于同样的文化和民族这种“抽象感情”，而不是构成韩国文化认同感的具体内容。因此，“韩国人不存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在韩国只存在着同属于韩国民族的抽象感情意识，而不存在对韩国认同感起到积极作用的（具体）理性内容。也就是说，在韩国充斥着认同感的丧失带来的“自尊心”，但却没有能够向外界展现的值得骄傲的东西。因此，李真宇要寻找能够向外界展现的足以自豪的“内容”。为此，他在自问“韩国性指的是什么”之后，得出结论，‘情’就是其答案。李真宇说，“我们共同具有的、积极的民族性是什么？我认为韩国民族比任

何民族更重视‘情’，‘情’是组成韩国人的性格和文化认同感的核心因素之一”。李真宇还主张‘情’既具有感情内容，也具有理性内容。简单地说，‘情’基本上是理性的。也就是说，‘情’在构成文化的认同感的同时，也包含我们对人性的固有解释。李真宇认为以‘情’融为一体的，那就是韩国人。也就是说，韩国人的认同感能够概括为‘情’。

李真宇认为韩国人和韩国文化认同感的主要内容是‘情’。这是正确的吗？如果阿拉斯加人也像我们一样富有‘情’，那么，阿拉斯加文化和我们韩国文化应如何区别呢？我们也可以说阿拉斯加人是以‘情’融为一体的民族吗？认同感必须能够区别于其他民族，那么，‘情’能否完成其任务？

上面我们讨论韩国的认同感，但要回答“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只靠认同感还不够的。即使我们知道了“韩国性的是什么”，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一个人知道自己是人，而不是鬼，但他还必须知道做人之道。同样，即使我们确定了决定“韩国性”的标准，但我们还必须要回答“作为韩国人应该如何生活才对”这一问题。如何维护民族的自尊心？韩国面对强国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战略呢？只靠认同感很难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把这些问题留在“韩国的主体性”一书中去讨论。

后记

有话说“哲学不能烤面包”。这句话是在讽刺哲学的无用性和非现实性。事实上哲学的确不能烤面包，但哲学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烤面包，为什么要吃面包。其实哲学不必烤面包。人类不能只靠面包生存，同时还需要知道烤面包和吃面包的理由。因此，我们不能说哲学是无用的和非现实的。如果我们指责哲学的非现实性，哲学家们就会反驳说，哲学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来思考现实，这是哲学的本质。根本上，我也同意这一看法。物理学也好，其他学问也好，都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确保客观性。

哲学不进行实地考察，不像考古学家那样直接挖掘，也不像化学家那样需要实验室，也不像统计学家那样进行民意调查。哲学家是以别人的资料为材料进行思维的。也就是说思维是哲学家们的主要业务。没有实验室，不必到外面进行实地考察，也不像画家一样面对画布而苦恼。深入思维，这就是哲学家的典型。因此，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韩国哲学家们并没有与一般哲学家相悖。作为哲学家，必须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深入思维。但问题不是哲学家的普遍形象，而在于哲学家的思维内容，也就是哲学家思维的内容是什么的问题。最近，韩国哲学界正在反思其内容。也就是说，他们主张抛弃舶来品的哲学，而在韩国搞以我们的问题为对象的哲学。这是很让人鼓舞的事情。虽然有点儿太晚，但总之是进入了正常轨道。

我在这本书里思考了韩国的认同。我认为韩国认同是目前我们面临的紧迫又重大的问题。但我不知道这样的工作属于哲学的哪一部分。这既不是西方哲学，又不是东方哲学，是韩国哲学吗？我们如何规定韩国哲学呢？我们是否正在像对待韩国传统音乐或韩国画一样对待韩国哲学？我认为韩国哲学的情况与韩国传统音乐没有什么不同。韩国哲学对认同的混乱和美术界对韩国画概念的混乱也是一样的。对于目前我们最紧迫的问题的思考，是属于哲学的哪一部分？回答这一问题并不简单。金在权曾经说过“就像‘西方科学’听起来不舒服一样，西方哲学也不是正确的表达，因此，除了历史意义上的‘韩国哲学’以外，不应该使用‘韩国哲学’这一表达方式”。把韩国哲学局限在历史意义上，真是岂有此理！金在权也陷入了普遍性陷阱。一般陷入普遍性陷阱的人就会成为强国的传声筒。金在权也是美国的传声

筒。

我认为韩国哲学是存在的。这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也不是意味着“在韩国”的哲学。我相信在韩国存在着能够展现韩国特殊性的形式和内容的哲学。判断韩国哲学认同的标准有现在性、大众性和主体性。如果有满足这三个标准的哲学，那么，无论来源，它就是韩国哲学。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世界主义者和普遍主义者。尤其是在像我们韩国这样弱小的国家里，从强国引进的哲学就成为普遍哲学。在日本统治时代通过日本引进的德国哲学扮演了普遍哲学的角色。解放后引进的美国哲学和德国哲学互相媲美。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为别国的哲学互相斗争。

小李访问非洲的一个小国。但他开始怀疑这个国家的认同。小李认为至少在哲学方面可能可以维持认同，持这样的想法，他走到哲学会。但在哲学会上的哲学家们都围绕韩国的性理学展开争论。围绕主理论和主气论问题都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有人说，我在韩国以关于退溪的论文获得学位，所以我的理论是可靠的。还有人说我跟韩国的栗谷专家很熟悉，所以我更精通韩国哲学。另一个人说韩国哲学来源于中国，我的专业就是中国哲学，所以我是真正的韩国哲学专家。大家都对于原文的解释问题展开激烈的舌战。他们都争论得非常认真，甚至悲壮。小李在想，他们为什么这么认真讨论别国的哲学呢？韩国哲学能够解决他们正在面临的紧迫问题吗？他们只是为了打发闲暇时间而追求人类普遍价值吗？还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知识的好奇心了吗？小李想告诉大家，在韩国已经不再为主理论和主气论问题而争论，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人类普遍问题。小李依然希望相信目前还存在为自己的问题而思考的哲学家。